

创造与保护： 为什么需要更多的再分配^{*}

蔡 昉

【内容提要】 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发展分享方面的经验以及全球性收入分配恶化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分化现象都证明了经济学传统观点即坚信经济增长可以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或者把效率与公平视为非此即彼且不可兼得的取舍关系的失灵。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分享的任务尚未完成。在迈向高收入阶段的过程中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充分分享性需要应对一系列崭新的挑战。这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提高生产率必然要求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更大作用,需要同时兼顾企业的优胜劣汰与对劳动者的社会化保护。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呈现递减趋势,需要更好地发挥作用。最后,新科技革命过程中,创新和创业成果的股份面临诸多难点需要克服。这都要求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实施再分配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劳动力市场制度、收入分配政策以及其他旨在改善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务。

【关键词】 穆勒难题;奥肯取舍;创造性破坏;再分配

【作者简介】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 邮编:100732)。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20)01-0005-17

^{*}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一 引言

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障碍,不能突破这些障碍便无法实现期望的进步;伴随着进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称之为“成长中的烦恼”。越是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与之相伴的此类烦恼也就越多、越复杂、越难以应对。虽然此类问题大多与特定发展阶段相关,却不会随时间变化而自然消失。无论何时何地,它们都能带来不利的结果,甚至阻挠一个社会的前进步伐,干扰其预定目标的实现。

发展中的问题最终需要发展予以解决,只有继续把蛋糕做大,才能创造出必要的条件分好蛋糕。然而,在发展中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发展的目的,需要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和时点体现出来。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与共享发展如同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因此,要形成良好的平衡,既不能只增长不分配,也不能先增长后分配,同时不可须臾或缺,而要根据发展阶段的变化,与时俱进,保证高质量发展成果也得到充分分享。

本文分析将表明,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初次分配功能不再足以满足在新发展阶段实现发展成果充分分享的制度需求,更高质量的发展要求更多的再分配政策。

二 突破“穆勒难题”和“奥肯取舍”

作为市场与政府关系这一旷日持久争论中的一个特殊话题,劳动力市场机制与社会保护的关系问题,及至效率与公平目标孰先孰后的问题,在学术界、决策圈和社会上争论不休。理论和理念决定政策方向,最终产生不尽相同的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结果。反过来,政治上的分化又会强化人们信仰的理念。以美国为例,在长期显现工资增长停滞、中产阶级规模萎缩和收入分配恶化的情况下,虽然人们渴望改善现状,却不知究竟该相信哪个党派、何种执政理念、什么政策承诺。政治观点空前分化,人们事实上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有个插曲足以说明美国人观点的对立以及认识上的混乱。2019年7月,一百余人登上阿拉斯加邮轮“菁英极致(Celebrity Solstice)”号,参加为期一周的第四届“反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巡航之旅。这个非经济学家的自愿聚会是在两位自称“自由意志论者”的经济学家主持下,驳斥克鲁格曼的“自由派”经济学观点的活动。这里争

论双方的两个“自由”之间并无共同的含义,克鲁格曼的批评者是崇尚奥地利学派的“自由论者(libertarian)”,克鲁格曼本人则自称“自由派(liberal)的良知”。一如既往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关于政府应当承担社会保障责任的观点遭到作为同行“冤家”的两位主持人以及各种口味的业余自由意志论者的逐一反驳。^①

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普遍出现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现状不满、政治严重分裂的情况下,大多数执政者或者竞选者竭力对民意做出回应,但最终多转向或左或右的民粹主义。然而,历史似乎又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民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不止一次地在不同国家归于失败。因此,在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在检视各国经历的种种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对传统观念予以反思具有日益增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探索流行理论的本源,是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的前提。

一般认为,在“铁血首相”俾斯麦(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统治时期,德国建立起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体系。然而,以《济贫法》为标志,英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历史更为久远。自这种制度萌芽、形成到发展至今,正反两面的争论从未停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著作中以合情合理却不无中庸的方式对于公众救济政策做出了一种概括:无论就哪种帮助来说,都需要考虑到两种结果,一种是帮助本身的结果,另一种是依赖于帮助的结果。前者一般是有益的,后者则大都是有害的,而且在许多情形下,害处是非常大的,以致弊大于利。因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微妙而重要的,即如何在最大的程度上给予必要的帮助,而又尽量使人不过分依赖这种帮助。^②

很显然,这个“微妙而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旷日持久、延续至今未解之两难,可以称之为“穆勒难题”。不仅如此,后来的讨论或明或隐地将其发展为一个二中择一的权衡(trade-off)问题。例如,阿瑟·奥肯(Arthur M. Okun)在其出版于1975年的一部著作中就把与此相关的一个更广泛命题即公平与效率关系视为一个非此即彼,从而需要进行取舍权衡的大问题。^③为了与“穆勒难题”相对应,我们可以把奥肯的命题称为“奥肯取舍”。

^① Lizzie O'leary, "The Anti-Krugman Libertarians at Sea," *Bloomberg Businessweek*, September 30, 2019, pp.48-51.

^② 约翰·穆勒著,赵荣潜、桑炳彦、朱泱译《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十一章第十三节。

^③ Arthur M. Okun,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The Big Tradeoff*,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5.

从穆勒到奥肯,他们的观点构成了社会保护问题认识的主流,即究竟需要市场机制与社会政策之间的何种平衡,才能实现人民福祉的改善。在学术争论、政治对立和政策抉择中,思想和理念无疑影响着人们进行选边站队,既得利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在政策实施层面,也派生出诸如“识别”(哪些人真正需要帮助)和“掂量”(需要给予何种程度的帮助)等一系列技术层面的难题。

从古今中外、多种多样的民生实践中认真思考得到的丰富经验与教训表明,是时候突破传统观念及其分析框架了。在理念上把提高人民福祉作为发展的目的本身,同时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就能够摆脱“奥肯取舍”的束缚,进而破解百年之“穆勒难题”。进一步,则可以在政策原则上取得共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坚持做大蛋糕这个“硬道理”,也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完善社会保护体系,公平合理地分好蛋糕。

三 创造与破坏: 超越熊彼特式创新

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早期阶段,改善劳动激励和提高配置效率的空间很大,清除压抑劳动积极性和经营自主权以及妨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改革,具有带来立竿见影的增长效应并且总体而言不损害任何利益群体的帕累托改进性质。相应地,这些改革从微观层面使生产回归可能性曲线,在宏观层面使经济增长符合人口红利支撑的高潜在增长率。因此,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源泉亦如“低垂的果子”,只需举手之劳。

首先,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迅速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农户生产剩余索取权,极大地调动了农业劳动和经营的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研究显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个体制变革因素对1978—1984年农业产量提高的贡献率为46.9%。^①农民在增加产量的同时提高了收入,降低了贫困发生率,而城市居民获得了更多数量和更高质量的农产品供给。

其次,在解决了微观激励问题的同时,农民也获得了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长期积累并在改革后被显性化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在产业间、城乡间和区域间得到重新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剩余劳动力得到更充分的就业,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以满足和丰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推动了整体经济增长。在非公有经济发展促进了经济成分

^① Justin Yifu Lin,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2, No.1, 1992, pp.34-51.

之间竞争的同时,在很长时间内农民工就业并不构成对城镇居民的直接竞争。

最后,在时间上与改革同步,对外开放以分区域、梯度式、渐进性的方式推进,通过引进外资和扩大贸易,把人口红利依次转化为制造业产业的比较优势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凝结着劳动要素的产品在国际贸易中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这意味着国内劳动要素的回报率得到提高,城乡居民先是通过扩大就业,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则是通过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增加了收入,改革开放红利被更广泛分享。

随着2004年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并在2010年以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时期为标志,人口红利加速消失,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唾手可得的生长源泉不再可得。一方面,与人口因素相关的生产要素积累和投入因素不再能够支撑高速增长,增长新动能必须来自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以劳动力转移的形式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不再能够支撑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生产率提高,新的生产率源泉只能来自创造性破坏过程带来的创新。

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成长中的烦恼”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在其两部重要著作中阐释了他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提出了影响至今的诸多重要概念,如企业家、新组合、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等。^①从与本文主题的相关性出发,以下对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逻辑进行简单的概括,^②并揭示其政策含义。

熊彼特首先勾画了一个静态的经济情形,作为构建动态经济发展理论的参照系,他称之为循环流转(circular flow)。其中,生产要素按照不变的方式进行配置,这个经济情形不具备经济发展应有的动态性,没有新组合因而没有创新,也不存在熊彼特本人所定义的以创新为天性的企业家(这时,经理人只是静态的经济主体而已)。从这个静态经济情形出发,一些经理人为了获得企业家利润,开始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的组合,或者说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因而形成他所定义的创新,这就使经济过程成为动态的经济发展。可见,在熊彼特式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创新是活力之源。

这种熊彼特式创新活动以两种方式具有“创造性破坏”的性质。第一,在加入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原料供给或新组织形态的要素新组合过程中,创新必然有成

^① 约瑟夫·熊彼特著,何畏等译《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约瑟夫·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② 参见拉斯·特维德著,董裕平译《逃不开的经济周期》,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特别是第12章“创新与经济周期”;理查德·斯威德伯格著,安佳译《熊彼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功也有失败,企业有进入就有退出。第二,对率先进行创新的企业家的追随和模仿造成创新活动的蜂聚现象,推动过热、过度的投资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危机,造成宏观或整体上的经济损失甚至社会灾难,并且这个过程以经济周期的形式周而复始地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创新才有经济发展,而创造伴随着破坏,繁荣是衰退的原因。

可见,在必须依靠创造性破坏机制进行创新的条件下,存在着对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动回报的不确定性。承担这种风险固然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定义和创新含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创新活动的风险也必然殃及其他社会成员,如造成工人的福利损失,反过来可能形成对创新活动的制度性阻碍。换句话说,创造性破坏机制固然是创新所不可或缺的,其本身却又可能造成两种不期效应,即潜在创新数量的减少和创新成功率方差的增大。如果不能处理好这种不确定性,就会造成对创新的压抑。在不降低创新激励的条件下,以更广泛覆盖且相对慷慨的社会政策托底,无疑可以减轻潜在创新受损者的后顾之忧,更能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防止劳动者成为受损者。

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实践看,政府实施更多的社会保护政策、扩大相关领域的公共支出规模及比重不仅不会降低创新活力,反而具有提高生产率的效果。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利用35个OECD成员的数据,观察社会领域公共支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与每个就业人员创造的GDP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社会领域的公共支出或社会保护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总体呈现互相促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较为显著的统计意义上,一个国家公共支出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越高。一些国别研究和国际比较研究也揭示了这种描述性统计所显示的相关关系背后的事实。

虽然美国经济以其技术前沿、竞争充分、品牌集中等优势多年享誉全球,较早时期的研究显示,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生产率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生存与死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①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经济已经日益显示出对新企业进入的排斥以及对平等竞争的制度性阻碍。^②托马斯·菲利普(Thomas Philippon)在其新出版的著作中提供了由于阻碍竞争导致的美国企业垄

^① 如参见 Lucia Foster, John Haltiwanger and Chad Syverson,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 Selection on Productivity or Profitabi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8, No.1, 2008, pp.394-425; Lucia Foster, John Haltiwanger and C. J. Kriza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Lessons from Microeconomic Evidence," in Charles R. Hulten, Edwin R. Dean and Michael J. Harper,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Productivity Analysi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② Luigi Zingales, *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 Recapturing the Lost Genius of American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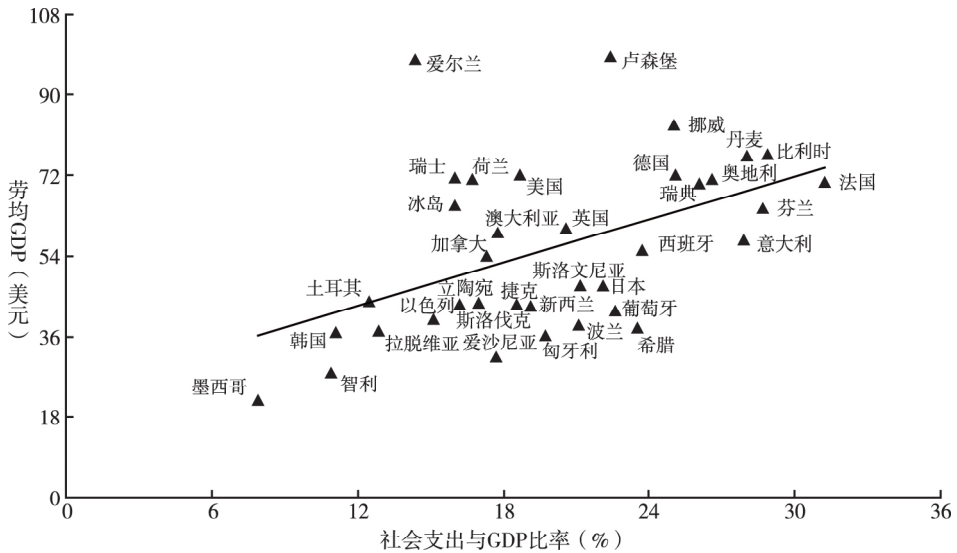


图1 社会保护与劳动生产率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方网站 <https://stats.oecd.org/>, 访问时间: 2019年10月11日。

断性和集中度提高的经验证据。^①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也指出, 动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可以使人人分享的信念已经不再能够成为现实。相反, 不充分的竞争、孱弱的生产率增长、严重的收入差距以及堕落的民主都标志着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圭臬的传统资本主义模式已经难以为继。^②

与之对比, 曾几何时因“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制而受到诟病的“瑞典模式”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列出了这一模式的几点“罪状”, 包括弱化家庭功能, 降低工作、储蓄和创新激励, 抑制资本积累和限制人们的自由。^③ 由于该模式在实践中也显示出一些问题, 以致其一度被视为失败典型。但是, 瑞典在并未放弃这种福利体制的前提下进行了成效显著的改革, 促使人们对其进行新的评价。早在1999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 克鲁格曼就对瑞典的技术创新和经济表现

① Thomas Philippon, *The Great Reversal: 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② Martin Wolf, "Saving Capitalism from the Rentiers,"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18, 2019.

③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New York: A Harvest Book · Harcourt, Inc., 1990.

赞誉有加“谁承想瑞典模式竟然奏效了。”^①随后,更有经济学家对瑞典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经验研究,揭示其意想不到的成功背后的改革效应。例如,弗里德里克·海曼(Fredrik Heyman)等探讨了瑞典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发现旨在强化“创造性破坏”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产品市场改革以及税收改革等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进入障碍,对劳动生产率提高产生了积极效应。他们的估算表明,在1996—2009年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中,配置效率改善的效应十分显著,而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贡献高达65%左右。^②

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者用瑞典经济改革的成功来解释经济增长表现的改善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较为充分的社会保护无疑也是让社会和企业敢于和乐于拥抱创造性破坏机制,从而使改革能够成功的重要条件。进入和退出分别意味着岗位的创造和破坏,资源重新配置也涉及劳动力的流动和替代。虽然这个过程最终效应也可以是就业总量的扩大(瑞典即如此),但是在劳动力流动和转岗的过程中无疑都会遇到如何保护劳动者的问题。

只有当社会能够为劳动者遭遇的摩擦性失业进行托底保障,如提供失业保险以及政府举办的技术培训和岗位介绍等公共服务,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才无须以保护岗位为借口阻碍进入和退出。瑞典利用自身已经存在的社会保护网,通过改革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处理关于劳动者的“内部人—外部人”关系,解决前者倾向于排除后者竞争的问题;二是克服过去存在的“弱创造性破坏”,解决为保护现存无效率企业而形成的进入障碍问题,最终取得了在创造性破坏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成效。相应地,劳动者既可以从无效率的岗位上转出来,又能够在被重新配置到下一个岗位之前在社会层面得到必要的保护。

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通常有一种误解,认为对劳动者的社会保护会使一个(发展中)国家(过早)向“福利社会”靠拢,并且这种福利社会通常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社会保护缺失是把劳动者保护在企业内部,反而造成企业经营过程和重新配置中的巨大效率损失。通过包括社会协商在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保护,允许劳动力流动,无论是向生产率更高企业集中的重新配置,还是暂时的退出和转岗,恰恰是利用社会政策托底改善效率的更有效做法。

^① Paul Krugman, “Who Knew? The Swedish Model Is Working,” in Paul Krugman, *The Great Unrave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 New York and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② Fredrik Heyman, Pehr-Johan Norbäck and Lars Persson, “The Turnaround of Swedish Industry: Reforms, Firm Diversity and Job and Productivity Dynamics,” IFN Working Paper, No.1079,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5.

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必然需要鼓励企业进行熊彼特式创新。熊彼特本人并没有就形成创造性破坏机制的条件展开论述,但是,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后来涌现出来的大量文献都表明:一方面,这种机制对于创新发展是不可回避的;另一方面,创造性破坏既不排斥社会保护,更因牢固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而得以更健康地发生。北欧模式的成功已经表明,社会保护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手段和保障,福利型国家与竞争型国家不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互为条件。^①这种把优胜劣汰与社会保护两种机制有机结合的实践和理念可以被称作“超越熊彼特式创新”。

四 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递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获得了广泛的分享。这种发展的分享性质及其实现机制与特定发展阶段和发展类型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中国处于一个有利的人口机会窗口期,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抚养比持续下降。各方面改革通过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化障碍,把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企业中的冗员吸纳到迅速成长的新的就业领域,实现了资源重新配置。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劳动力丰富的资源优势被转化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进而在国际分工体系中赢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优势,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张的同步。

从理论上讲,这个阶段的经济增长特征具备成果分享的性质;从实践上看,这一潜在条件也通过改革开放得到充分利用。利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涨的机会,中国在国际分工中主要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中以丰富的劳动要素交换发达国家的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如图2所示,在中国人口机会窗口期相重合的时期,即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中国货物出口发达国家的部分占比始终在75%以上;同时,中国货物进口中来自发达国家的比重同样很高。

从整体来看,这种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国际贸易的结果意味着中国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国,劳动要素的回报率也由此得以提高,城乡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机制分享了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具体来说,在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特征的时期,由于工资上涨较慢,居民收入整体增长主要依靠就业扩大和劳动参与率

^① 克劳斯·彼得森《北欧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动态关系——为福利而增长还是为增长而福利?》载郑功成、沃尔夫冈·舒尔茨《全球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关系:回顾与展望》,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9年版,第230—23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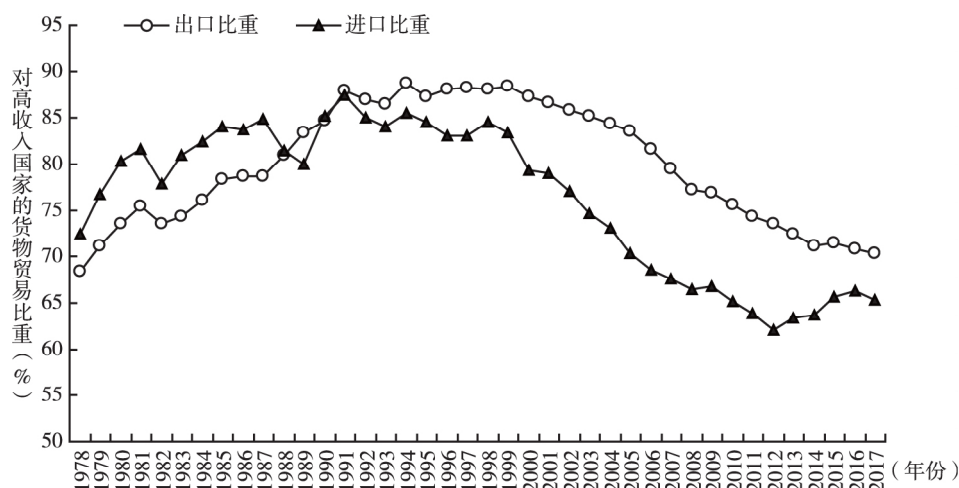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贸易方向与比较优势变化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 访问时间: 2019年10月20日。

提高;而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城乡居民则主要通过劳动力短缺引起的工资上涨增加收入。

随着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人口抚养比步入上升轨道,中国延续30年的人口机会窗口开始迅速关闭。这种变化对劳动力市场的最主要影响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最显著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弱化。具体表现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城乡就业扩大和资源重新配置都不再像以往那样以疾风暴雨式的节奏进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加速减弱,国际贸易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对象的特点也趋于淡化。相应地,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功能不再能够单独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也不足以解决民生领域面临的其他问题。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还会出现若干新特点,构成降低社会流动性的因素。社会流动是一个有关各群体社会地位变化的复杂问题,涉及社会阶层结构格局、居民幸福感和对社会公正的认同以及社会是否具有凝聚力等。职业在代际和人口队列之间的变化通常可以作为一个显示性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流动的变化趋势。因此,本文将主要从职业变化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讨论,并由此入手探寻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因素。

一般来说,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迅速变化并且教育得到广泛普及和提高的发展阶段中,职业结构趋于向人力资本含量和社会地位更高的水平提升,与此相应的变化也比较剧烈,因而社会流动性较强。在创造更多向上流动机会的同时,并不

会以相同的概率让另一部分人的向下流动为代价。这标志着经济发展更具分享性,并且社会流动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向上流动多而向下流动少)。因此,我们可以抓住职业结构变化的两个重要因素,对社会流动变化趋势进行观察:一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作为职业结构变化的需求侧因素;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作为职业结构变化的供给侧因素。在两者皆呈现较快发展的条件下,就表现为职业结构的高度化,通常也导致社会流动性的增强。

根据第五次(2000年)和第六次(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我们计算两个指标:一是分年龄组的受教育年限,即根据人口普查数据中分年龄组的受教育阶段,分别赋予受教育年限,“未上过学”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学专科为15年,大学本科为16年,研究生为19.3年(按硕士生和博士生人数的加权平均值计算);二是分年龄组的职业高度化,即计算每个年龄组中职业被定义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两部分人员合计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根据这两个指标,既可以观察十年间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构成的变化,也可以观察在同一时点上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构成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年龄分布。

根据数据反映的趋势(图3)我们可以获得以下重要信息:首先,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人均受教育年限)和职业高度化水平(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或“白领”职业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都随时间得到显著提高。^①这是与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结构变化和教育发展相一致的。其次,从同一时点上的各年龄组比较来看,平均受教育水平随年龄提高而降低,相应地,职业高度化水平也随年龄提高而下降。由此可见,人力资本无疑是保障个人职业提升正面且重要的影响因素。

职业构成的升级过程及其可能发生的减速也可以从上述关系中预期到。从2002—2006年平均来看,16岁及以上人口中“白领”职业构成为12.5%;到2012—2017年,这个平均比重提高到18.9%。但是,若干与人口红利消失相关的因素通过与人力资本积累速度放缓共同作用,产生使职业结构升级势头弱化,进而使社会流动趋势减弱的效应。

首先,一般来说,在普及初中义务教育阶段,人均受教育年限能够快速提高。不过,即便在这样的时期,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存量中更多的是人力资本禀赋较低的人群,劳动年龄人口整体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也相当平缓。一旦义务教育得到较充分

^① 在这一点上,中国因其经济和教育都处于高速发展而与发达经济体有所不同。例如根据研究,在英国的职业结构变化中,教育所起的作用并非决定性的。参见 John H. Goldthorpe, “Social Class Mobility in Modern Britain: Changing Structure, Constant Process,” *Journal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4, 2016, pp.89-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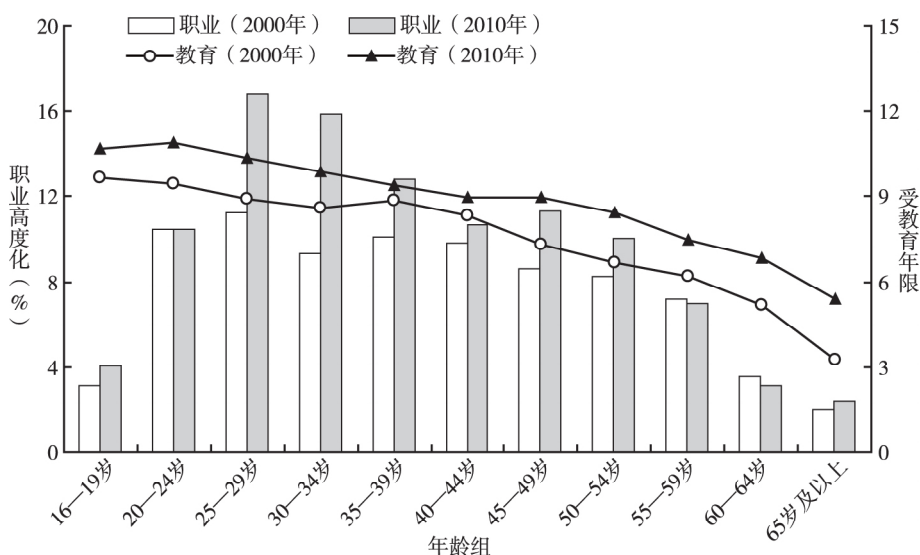


图3 分年龄人群的教育水平和职业构成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 访问时间: 2019年11月1日。

的普及和巩固 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难度就更大了,教育扩张就不再能够保持超常规的速度。

其次,由于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总体受教育水平的改善主要依靠这种增量效应,随着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每年新成长劳动力的人数减少、增速下降,意味着人力资本增量减少,劳动年龄人口整体人力资本的存量改善,也就不可避免地减慢速度。此外,人口老龄化也导致劳动力老龄化,由于劳动年龄人口中的各年龄组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职业结构特征,职业高度化水平随年龄增大而降低,因而从静态意义上降低了社会流动性。

最后,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一定阶段,例如,自2004年中国经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之后,普通劳动力出现持续短缺现象,导致低技能工人的工资上涨快于高技能工人。这意味着,在这个特定时期,人力资本的市场回报率趋于降低。由此产生的信号会对教育产生负激励,个人和家庭的升学和在学意愿下降,从而削弱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降低未来的社会流动性。

如果一个社会要保持较高的流动性,视其所处的发展阶段或环境通常分别需要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在高速成长和结构变化过程中,社会流动性以正和博弈(从而帕累托改进)的方式发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城乡居民对发展成果的分享主要是以这种社会流动的方式进行的。然而,如果把这看作提高社会流动性的唯一途径,则会得出

结论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社会流动性也会下降,因此除了保持经济增长别无他途。^① 虽然发展是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我們也不应该拒绝下面将讨论的另一条可行并且应该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在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都处于相对静态的条件下,社会流动好像只能以零和博弈的方式进行。这里似乎产生了一个社会流动的“合成悖论”。在更为高度化的职业位置有限且不变的情况下,每个人和家庭都会力争上游,即处于更高职业位置的力图保持既有格局,而处于较低职业位置的希望打破现状,使得社会流动成为一种零和博弈:一些群体在职业阶梯的向上流动与另一些群体在职业位置的下滑成为社会流动性变化这一枚硬币的两面,彼此互为因果,相伴发生。

如果一个社会的确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流动悖论,从而使得零和博弈大行其道的话,就有极大的可能造成收入分配状况恶化和固化,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一方面,处于社会流动阶梯下端的群体力图打破既有格局;另一方面,处于社会流动阶梯上端的群体形成维护既得利益的更强动机。两者的交互作用造成社会凝聚力与和谐性的降低。鉴于此,再分配政策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与靠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会相配合,既要保持和扩大社会流动性,还要缩小社会流动阶梯上下两端的实际差距。

五 如何分享创新与创业的成果

纸上谈兵或者只是在沙盘上进行推演的发展经济学家通常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现象定义“刘易斯转折点”。一旦进入现实世界,他们会发现,刘易斯转折点包含了诸多转折性现象。例如,一个国家跨过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供求关系的逆转即发生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变化,受雇者与雇主之间的谈判地位发生了有利于前者的变化;在公共决策中,由于制约发展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从资本越来越转向劳动,政府对劳动者的政策保护偏向和实施力度也趋于加强。^②

基于对早期经济史的观察,经济学中有一种传统观念倾向于认为,一经进入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的经济发展阶段,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就一劳永逸地确立起来。虽然

^① 针对发达国家情形,沃尔夫似乎就持这样的观点。参见 Martin Wolf, “Hypocrisy and Confusion Distort the Debate on Social Mobility,” *Financial Times*, May 3, 2019.

^② 参见 Cai Fang, “The Hukou Reform and Unification of Rural-Urban Social Welfare,” in David Kennedy and Joseph Stiglitz, eds., *Law and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stitutions for Promoting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441, p.454.

每一个局部的情形仍然有赖于具体的讨价还价结果,但整体而言天平是向劳动者倾斜的。然而,当今世界的现状并非如此展现在人们面前,反而呈现各种看似异样的表现。例如,各种类型的民粹主义鼓吹者取得或正在争夺国家行政权力,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陷入愈演愈烈的党派之争,普通民众因处于全球化造成的不同境况而陷入彼此之间的政治对立,使人们对民生福祉和收入分配问题既不能充耳不闻,也不能避而不谈。此时更需要认识其产生根源,拿出正确的应对策略。

由“摩尔定律”和“库兹韦尔奇点”等概念所刻画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发展可以很好地展示现代科技发展的颠覆性,早期笼而统之的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如今已经在互联网、社交网络、交易平台和物联网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在全球化背景下,其影响遍及世界每个角落的每一个人。对于这种技术发展趋势的经济社会影响,可以做如下阐述和概括。

报酬递增导致垄断的规律没有发生变化,因此,具有更突出的报酬递增性质的新技术革命必然产生前所未有的垄断倾向。在中国和美国等高科技企业数量领先全球的国家,人们看到的一个日益普遍的现象是,明星科技企业创造巨额亏损,却仍然获得很高的市场估值,从私人 and 公众那里获得天价融资。这自然会引起人们对科技泡沫和金融危机的担忧。研究发现,美国公司上市之前一年处于亏损状态的比例在 2000 年互联网泡沫危机时高达 81%,2018 年则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水平。^① 我们知道,任何时候一旦危机爆发,总是普通劳动者和消费者受到最大损害。

不过,这还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不是问题的重点所在。明星企业的垄断和追求更大的垄断地位的倾向是当今世界民生福祉下降、收入分配恶化、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对立的根源。人们或许以为,这里我们又一次面临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取舍权衡问题。其实,大企业的垄断地位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既确定无疑地伤害了公平,也不会产生效率。

即便科技明星企业是由于创新起家,一旦它们取得垄断地位,生产率提高不再是其成长的源泉,创新动力也便随之丧失,甚至可能成为创新的阻力。马蒂亚斯·科瓦鲁比亚斯(Matias Covarrubias)等对过去 30 年美国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特征进行分析,发现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在低集中度、严酷价格竞争和无形投资的条件下,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生产率提高很快;进入 21 世纪以来,由于无效率集中度提高、竞争弱化、进入障碍增强,处于领导地位的企业垄断性得到强化,导致投资不足且伴随着集

^① Matthew Vincent, “Lossmaking Tech Companies Are Floating like Its 1999, Making Some Investors Wary,” *FT Wealth*, Issue 56, 2019, pp.44-45.

中度提高和价格高企,生产率的增长也明显减慢。^①在并不改善效率的情况下,增强的垄断倾向却确信无疑地对公平造成损害。

首先,垄断必然产生强化资本收益、抑制劳动收益的结果。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揭示了相对于经济增长资本收益不成比例的提高是收入不平等的根源。^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认为与新技术革命相关的企业经营已经使得各种要素的收益主要由权力决定,而不再根据各自的贡献来决定,因此,不受约束、不可遏制的市场垄断是资本收益持续提高、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根源。^③

其次,对于迅猛发展的大型科技企业而言,普惠效应并不能由其本性中自然而然产生。人们逐渐发现,这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科技大公司或平台公司并不具有普惠性或者分享性,零工经济所创造的就业与其破坏的岗位在数量上难分伯仲,使这种新的就业形态既无安全感,更与社会保障脱钩。在不断高涨的社会抨击和反垄断调查的促动下,舆论界和企业界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企业目标或责任的大辩论,争论的焦点是企业应该着眼于股东收益最大化,还是应该关注职工福利,或者社会责任为先。可以想见,没有外在的制度安排,仅凭大型企业自我良心发现或者自我约束,其发展的非分享性是难以遏止的。

再次,企业无限制的集中必然侵害普通消费者的利益,企业缺乏财务纪律的后果则由公共投资者承担。私募和风险投资对独角兽企业的大规模融资以及违反常规的并购和预防性收购旨在消除现行的和潜在的竞争者,而投资者和经营者并不承受这种损失,埋单人终究是消费者。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明星企业、独角兽,同时也不可对利维坦般的明星投资者熟视无睹,后者极力渲染企业发展的虚假繁荣,将其打造成资本市场的“宠儿”,最终作为私人投资者它们赚得盆满钵满,全身而退,把不确定性和风险留给公共投资者。

最后,垄断经营阻碍竞争者进入,减少全社会的创业活动和就业创造。虽然基于以往经验,做出关于机器人究竟将替代多少现有岗位或者以数字化为特点的新技术能够新创多少岗位的预测迄今并无定论,^④但是以下两个判断几乎可以是确定的:其一,

^① Matias Covarrubias, Germán Gutiérrez and Thomas Philippon, “From Good to Bad Concentration? U.S. Industries over the Past 30 Years,” NBER Working Paper No.25983, 2019.

^②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③ Joseph Stiglitz, “Monopoly’s New Era,”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high-monopoly-profits-persist-in-markets-by-joseph-e-stiglitz-2016-05>, 访问时间:2019年10月20日。

^④ Thor Berger and Carl Benedikt Frey,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OECD: Digitalisation, Deindustrialis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 OECD Social, Employment and Migration Working Papers, No.193, 2016, OECD Publishing; Takamitsu Sawa, “What Jobs Will Be Lost to AI and Robotics?” *The Japan Times*, October 13, 2018.

机器人对劳动者的替代显然不会遵循以往的速度进行。计算机技术应用范围扩大的速度前所未有,其替代劳动的挑战性必然超出所有的以往经验。其二,问题并不在于新技术创造的岗位能否填补失去岗位的数量缺口,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个就业破坏与创造过程在多大程度上以及多长时间里影响民生。实际上,不受约束的大型技术企业破坏就业的过程,也就是它们阻碍新的市场主体进入和创造就业的同一过程。

正如与工业革命同时诞生却始终遭到妖魔化的卢德主义思潮所表达的那样,技术进步和机器对劳动的替代从来不会自动改善人民福祉,即便创造出新岗位,被替代的与新创造的岗位所对应的也并非同一个就业群体,至少在短时间内不是如此。要想在新的发展阶段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绝不能拒绝创新、创业和与之相伴的创造性破坏。然而,人归根结底是发展的目的。低效率的产能应该被破坏,甚至过时的岗位也可以被破坏,唯独人不能被破坏。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让作为资源配置决定性机制的市场保持充分的竞争性,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同时加大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是让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作用的唯一正确方式。

六 结语和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全球化都不能自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效率与公平之间也并非注定是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取舍关系。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继续保持经济发展的充分享有性需要应对一系列崭新的挑战。随着劳动力产业转移带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的式微,提高生产率必然要求创造性破坏机制发挥更大作用;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效应也呈现递减趋势,创新和创业成果的分享面临诸多难点。这都要求政府承担更多的支出责任,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加大实施再分配政策。

首先,增强社会保障制度的普惠性质。包括基本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各种社会救助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虽然是从不同的风险角度进行制度设计,因而以不同的项目形式运作,但各类制度的共同目的是防范和抵御各种风险事件,对各类人群予以社会托底保障。碎片化的制度结构不能成为有机体系,并且由于识别和实施的交易费用高,很多此类政策的托底效能常常发挥不力,因此需要根据条件的逐渐成熟进行整合。每一项保障制度终究需要经过自身建立健全的过程,这固然是走向整合的必要前提,但是单项制度形成和完善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排斥整合的倾向。要避免这种现象发生,解决好单项制度发育与最终整合的矛盾,从一开始就要着眼于增强每一类制

度形式的普惠性,以便最终在这个共同基础上按照效率原则实现整合。

其次,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在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市场的运行也需要得到规制和规范。其中,由于劳动要素的性质与其他要素的情形有所不同,劳动力市场作为配置人力资源的机制需要更多的规制和规范。如果说资本市场规制着眼于防范资本要素对市场及其主体可能产生的伤害,劳动力市场规制则更着眼于防止对劳动者本身的伤害。因此,发育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努力不仅包括提高其配置人力资源的效率,还包括劳动立法和执法、最低工资制定机制、集体协商和劳动者权益表达等相关制度。

再次,实施收入分配政策。劳动力市场初次分配机制并不能保障收入分配公平,也未必带来效率。以往的发展不足甚至政策失误可能成为一种不利于某些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果,人力资本和其他个体性因素差异也会导致人们并不处于同等起跑线或竞赛条件,来自外部环境和不确定因素的冲击对不同群体的影响也有差异。这些因素都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配从社会角度来说并不一定是最适结果。因此,旨在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和调节过高收入收入分配政策是必要的。剔除OECD国家中收入差距较大的智利和墨西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高收入国家较为合理的收入分配状况实际上是在再分配之后才形成的。例如,经过税收和转移性支付,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从平均0.473下降到0.306,降低幅度高达35.3%。^①

最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府承担支出责任或者作为提供者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实现最大限度的均等化,才能实现保护弱势群体、降低各类风险和冲击、增强社会流动性、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设定目标。诚然,国家财力的有限性始终构成相应的资源制约,使得均等化只能以渐进的节奏和方式推进。然而,更明确的战略目标和更精准的制度设计可以通过确定最适宜的政策优先序来加快这个过程。决定优先序的因素包括相应的政策调整在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改善民生、获得社会回报率、成本收益比最小化等方面的显著性,选择成本最小、受益最大的领域率先突破,可以利用获得的社会效益支持进一步改革,形成良性循环。

(截稿:2019年11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① 笔者根据OECD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出 <https://data.oecd.org/>, 访问时间:2019年10月12日。

Abstracts

Globalization , Regionalization and Parallel Systems

Zhang Yuyan (1)

Creation and Protection: Why Do We Need More Redistribution?

Cai Fang (5)

【Abstract】In contrast to the widespread economic turmoil , social instability and political divide resulting from inequality in the present world , China has experienced successful progress in reform , opening-up , growth , and sharing. Both experiences prove wrong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 which presumes the trickle-down effect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quity. As China transitions towards the high income status ,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 have to be addressed. First , to increase productivity requires the mechanism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 which inevitably involves displacement of workers. Secondly , in the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 the function of labor market in primary distribution tends to scale back.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s ,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redistribution by means of social security programs ,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cies , and other basic public services aiming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people.

【Key Words】growing pains , creative destruction , redistribution

【Author】Cai Fang , Senior Fellow ,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reat Cognition in the Context of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Change of Australian Policy Towards China

Zhou Fangyin (22)

【Abstract】Since 2000 ,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had maintained a good development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